

陈安金 王宇著

永嘉学派
与
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

人民出版社

温州文化研究丛书

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

陈安金 王 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 / 陈安金 王宇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 月

ISBN 978-7-01-006743-8

I . 永… II . ①陈… ②王 III . ①永嘉学派—研究 ②文化史—研究—
温州市 IV . D244.92；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685 号

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

YONGJIAXUEPAIYUWENZHOUQUYUWENHUAJUEQIYANJIU

作 者：陈安金 王宇

责任编辑：邵永忠

文字编辑：范茂辉

封面设计：胡继红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100706 www.peolepress.net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装 订：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 期 间：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625

字 数：293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6743-8

定 价：38.00 元

版 权 所 有， 盗 版 必 究。 有 奖 举 报 电 话：(010) 65251359

人 民 东 方 图 书 销 售 中 心 电 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绪论 近百年永嘉学派研究概述

永嘉学派在历史上是一个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的学派，其主要成员都是温州籍人士，其学说在南宋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在宋、元文献中，永嘉学派多次被论者与朱、陆之学相提并论，^①黄震就以朱熹、陆九渊、陈亮、陈傅良为南宋学术的四大家，而叶适“混然于四者之间”，^②其中陈傅良、叶适都是永嘉学派的成员。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全祖望关于永嘉学派（“水心之学”）是与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鼎足而三的论断，则进一步肯定了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然而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中，永嘉学派研究只是很小的一支，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历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从永嘉学派诞生之日起，对它的研究和评价无不以程朱理学为参照系，似乎永嘉学派的理论特色只能从与理学的比较中才能彰显，在历史上，只有当人们发现理学不能应对时代的新挑战时，才想起永嘉学派的独特价值。这种研究路线延续至今，基本上仍居于主流地位。可喜的是，新的研究风气也在渐渐改变这一格局。

—

笔者不揣浅陋，先对近 100 年来永嘉学派的研究作一概述。

1. 作为理学对立面的永嘉学派研究 从明代开始，永嘉学派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永嘉学派的研究甚为寥落。直到程朱理学在西学冲击之下摇摇欲坠的近代，永嘉学才渐渐回到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中。首先是在永嘉学派的发祥地温州，在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发起下，温州籍士大夫陆续整理出了《永嘉丛书》、《敬乡楼丛书》，孙锵鸣撰作了《陈文节公年谱》，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对永嘉学派的思想特征的理解，主要是将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对立起来，突出永嘉学派对制度的重视，如宋恕说：

宋室南渡，瓯学始盛。陈叶诸子，心期王佐，纯于永康，实于新安。新安师徒，外强中鄙，阳述孔孟，阴祖商、李，媚上专权，抑制殊已。闽党横行，百家畔降，而瓯学亦几绝矣。^③

这种议论颇能代表当时温州人对复兴永嘉学必要性的认识，即永嘉学比朱子学“实”，即重视制度；比永康“纯”，即全祖望所说的将功利之说“一洗之”。宋恕提出的“纯”与“实”界定了永嘉学派研究的主题——“事功”。晚清的朴学大师孙诒让，虽然其主要学术成就被时人认为是属于汉学范畴的，但对宋代的永嘉学派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来自于他对清末文化危机的焦虑：

窃谓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稣基督之诬诞，《新约》、《旧约》之鄙浅，而乡曲儇子，崇信哗然，非有悦服

之诚，是借富强之助。输泉帛而润以脂膏，集兵力以广其保护，而牛马维姿之计，为蛇豕荐食之图。而中华儒者，犹复绅佩而谈诗书，雍容而讲礼让，非徒淹中绎简，无裨鲁削，窃恐议瓜骊山，重睹于秦坑。^④

在孙诒让看来，欧风美雨的侵袭对中国文化的危害不啻焚书坑儒，拯救这种危局的办法是，从历史上不受重视的小传统汲取新的养分，抵抗来自外部的侵蚀，他进一步阐述说：

乾嘉以来，巨儒辈出，而性理经术，各守其家法，不相假借，汉宋之间，益断然如也。某曩在京师，与方闻之士论当时门户之弊，常以为欲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学。……既而东南大乱，承学之士，日即于羌陋，而达官贵人有以武功起家者，遂奋其私臆之论，以为胜朝流寇之祸，萌蘖于姚江；道咸以来，粤匪之乱，由于乾嘉之经学。乡曲之士，眩惑其说，莫知所适从。今相国合肥李公有忧之，以为此邪诐之说而荒蕪之原也，思欲刊布先儒遗书以救其弊。^⑤

旧有的汉宋二元格局的学术范式既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就应该引入永嘉学以会通汉宋，来拯救文化。无独有偶，章太炎也十分欣赏陈亮、叶适，以为他们规划的治国方法很宏大，真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并给十年试行的时间的话，是可以有所成效的，但缺点是不知变通。^⑥

把永嘉学派与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导了相当长时间的永嘉学派研究。建国以后，研究者普遍地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立模式来解释永嘉学派，及其与理学的区别。在 80 年代初，陈玉森指出，叶适与陈亮不同，他是彻底反理学的儒家，而陈亮是理学之一支。^⑦周梦江认为，叶适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

观、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理学的、特别富于批判精神的思想体系。^⑧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分析理学与永嘉学派在思想上的分歧，仍然是永嘉学派研究的主流。1991 年，衷尔钜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了薛季宣、陈傅良，他在比较朱熹与永嘉学派学者的思想分歧时，不仅充分展开了薛、陈二人的观点，对朱熹一面的观点引证也很详瞻。在这一点上，使得该文在众多永嘉学派研究论文中显得非常突出。^⑨

潘富恩、刘华在 1994 年的论文中从四个方面对南宋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进行了论述。首先对事功之学的理论依据——“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作了分析，后依次对讲求实效的“实政与实德双修”的政治教育观、道德与事功相结合的“义利双行”的伦理观、“据往知今”的历史观给予了评述。进而说明南宋事功之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值得赞赏的是，这篇论文较早提出：永嘉学的“功利”，乃是“公利”，而非“私利”，“南宋的事功之学决不是道学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在利欲胶漆盘中’，因为他们所提倡的事功主要是指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公利，公利本身便体现道德。”^⑩

以上所举论著足以概括大多数论者的意见，只有包遵信等少数论文认为叶适代表的永嘉学派是古代唯物主义的大倒退。^⑪

2. 将永嘉学派整合到儒家道统的努力 随着研究的推进，另一种研究倾向也逐渐显示出来，即永嘉学派是否是理学的对立面？永嘉学派与理学的统一性在哪里？甚至有论者提出了永嘉学乃是理学一支的说法。如在何炳松的《浙东学派》一书中就已经将浙东各学派的源头统一为程学，这便暗示了永嘉学与理学潜在的同源性。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切

人，论述了永嘉学派与理学统一的一面，进而提出永嘉学派是儒家“内圣外王”道统之内的一系的新观点。

何俊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对永嘉学派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他 1994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用“道统”阐述了叶适与理学的分歧与统一，清晰地说明了永嘉学派与理学在儒学体系内的不同功能，他指出：“如果将这种思想对照于孔孟的整个思想，我们只能说浙东事功学偏重于儒家传统中的政治思想的传承，从而表现出与程朱哲学的兴奋点的相异，而无法下事功学的思想背离了整个儒家传统的论断。”

相反，何俊认为陈亮较叶适更为激进，已经背离了儒家传统。在后来的研究成果中，何俊进一步提出永嘉学派继承了儒家“开物成务”的传统。^⑫

杨太辛在 1996 年撰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永嘉诸儒发轫于伊洛理学，致力于《周礼》制度，由虚返实，通经致用，而非一无傍依的事功之学。因此，‘事功’不足以赅浙学。三是浙学重制度名数，有人以此作浙学为事功之学的论据。《象山语录》有一条陆学门人对朱陆的评价：‘或谓先生（指陆九渊）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这从另一方向反证了浙学与朱学异中有同：浙学重经制事功而归于性命义理，朱学重理气心性而不忘制度名物。概言之，浙学言事不离理，朱学言理不离事；浙学重事功而不能以事功限浙学，朱学崇性理而不能以虚无留朱子。这就是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⑬

所谓“一致”，就是儒家的道统，所谓“百虑”，则是具体的学派对儒家道统的不同侧面的理解。

陈国灿虽然将包括永嘉学派在内的整个浙东学派的理论旨趣

判定为“反理学”，却又指出永嘉学派与理学仍可以统一在儒学的藩篱之内：“要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思想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事功之学与理学的对立，虽具体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但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当时不同儒学流派之间的分歧。事功学者批判理学，不是要否定儒学理论，而在于使儒学朝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同当时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实效，恢复和增强其活力。”^⑩

徐洪兴则从“理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考察了永嘉学派在理学各派中的地位，他说：“今天，人们讲‘理学’，往往只讲‘性理之学’而不讲‘义理之学’，这样做一般说来也无可，因为‘性理之学’本是‘理学’的精髓。然而，倘若以为‘理学’仅仅只是指‘性理之学’，那就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而作为‘理学’精髓的‘性理之学’，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他进一步说：“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浙东‘永嘉学派’，其学术可以称‘义理之学’，但却不能称‘性理之学’，这里的‘理学’实指‘义理之学’。”^⑪

1999年商聚德在一篇论文中剖析了传统思想的义利观的架构，当谈到永嘉学派的义利观时，他特别指出：“（永嘉学派的义利观）对于传统义利观主流派观点的某些方面，起到某种纠偏、矫正的作用。他们强调义利统一，而反对片面突出义而否定利；强调人必有私，而反对以公压私、以公灭私；强调义在利中，而反对只讲义不讲利。但实际上，他们所持的义利标准，与传统义利观并无不同；他们的正面观点，总体上也并未超出传统义利观的范围，大原则上仍与传统义利观相一致，并且成为其有机部分。”^⑫

这样的研究能够纠正此前一些对永嘉学派义利观的片面武断

的看法，从而把永嘉学派与理学之间被有意无意放大了的分歧，恢复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尺度。

3. 叶适与理学关系的研究 在永嘉学派传世的著作中，以叶适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尤其是《习学记言序目》一书，为后人系统研究其哲学思想，尤其是认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近年来通过分析认识论来探讨叶适与理学的关系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董平在 1993 年指出，叶适的知识论拒斥了非经验的、形而上的知识对象，其知识范围被限定于经验领域。^⑩在董平的论文发表之后，学术界对叶适认识论的描述，其措辞逐渐由“朴素唯物论”过渡到“经验主义”。无独有偶，董根洪也指出了叶适的中和观的缺陷：“特别是在‘未发为中，已发为和的中’和问题上分析阙如。未发如何是中，又如何使‘未发之中’转为‘已发之中’？两者是什么关系？‘未发之中’与‘心性’又是什么关系等等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问题都未有什么分析揭示……由于对心性缺乏具体的多方位的分析，因此，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一点上，程朱陆杨恰成对照，理学中和哲学虽有偏失，但他们把中和哲学深入到心性领域，却是把儒家中和哲学大大地推进发展了一步。叶适中和论的特点实质上也是功利派的一大特点和缺陷。”^⑪

此文意在说明，叶适胶着于经验领域，实际上失去了与理学充分展开对话，进而超越理学藩篱的机会，他本人心性之学破虽有之，立则无之。早在宋元之际，刘埙就对水心之学有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评论：“况晦翁诋斥苏文，不遗余力，水心虽欲合之以矫俗，然其地位亦只文章家尔，终不见其往复讲辩如吕、陆。”^⑫

杨泽波则从叶适看到了存在于孔、孟之间的心性之学的分

歧，对叶适“内外交相成之道”做了更深入地分析。他认为叶适实际上是要回到孔子那里，以纠孟子以来理学重内向轻外智、重心轻耳目的偏向。但即使如此，杨泽波承认：“虽然叶适与朱子在事功问题上尖锐对立，但在为学之方的问题上却明显偏向朱子……叶适强调耳目聪明在成就道德中的作用，这显然是赞成朱子的主张。”^②符丕盛在分析叶适的认识论时特别拈出了一个“诚”：“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诚’。方法：内外交相成；途径：格物致知，自我反躬。认识过程分四段：致中和而后诚，诚以格物致知，致知而后意诚心正，意诚心正而后治国用事。”^③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叶适与朱熹在话语上所具有的同源性。

4. 对永嘉学派外部条件的研究 除了研究永嘉学派自身的思想及其与理学的关系外，对该学派产生土壤，以及该学派与宋代其他思潮互动情况的研究，从上世纪末以来涌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以永嘉学派与王安石的关系为例，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

至宋始专就制度以言之，而发现专制之根本困难在于集权过度，此病不除，虽有仁君贤臣亦不能致天下于安定。其重视制度之意，为前人所未有。至其论理财之兼斥新旧两党，而大旨实有契荆公。^④

史学界一般也认为，浙东学派既然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主张积极改革时政，那么他们与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应该很有相似之处。但李华瑞发表于2001年的论文推翻了这一结论，指出永嘉学派对王安石变法持全盘否定的态度。^⑤

在最近，蔡瑞霞研究了陈傅良与湖湘学派的关系，她分析了

陈傅良能够在张栻之后收尽湖湘门人的原因，思想方面的因素是因为陈傅良与湖湘学派在学术思想方面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和重践履的经世务实学风是有相通之处的。胡宏在《知言》中就已表现出某些非正宗倾向，他所强调的性为宇宙本体、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等等，张栻继承了胡宏的思想。他说：“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心“能统万理”并主宰万物，这就是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的特色。因此，二者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使得后来的湖湘学子易于接受事功学说。^②

日本学者冈元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宋代温州与永嘉学派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南宋科举试官的地域性——以浙东士大夫为中心》^③、《南宋温州士大夫的相互关系》^④等文章。在第一篇论文中，他用“穷举法”对南宋疆域内所有路、州的试官数量都进行了梳理，试图证明众多的浙东出身科举考官保证了温州举子在科场的优势。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借鉴韩明士（Robert · Hymes）宋代抚州士人研究的模式以及法国社会学者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再生产（Culture reproduction）理论，以图表的方式勾勒出了宋代温州成功的科举家族，及这些家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冈的论文揭示了几乎所有可能促成温州南宋科场成功的因素，太学解、漕试、对权相的依附、永嘉学派思想在科场的流行等等，其视角与方法是十分新颖的。

由于这些研究切口小而探径深，使得永嘉学派思想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如果将永嘉学派置于儒学框架内观照，不但能更恰当地解释永嘉学派的思想，而且有助于重新评价儒家“道统”，有助于拨去理学道统对儒学真道统的遮蔽，从而更深刻地思考儒学的现代化境遇问题。

二

不可否认，现有的永嘉学派研究存在着不足甚至空白之处。总结起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永嘉学派的研究基本没有跳出“南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没有运用更为广阔的历史大尺度去审视永嘉学派的思想发展历程，如上至唐、五代、北宋的浙江、温州社会文化状况探寻，下至元、明、清、近代乃至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思考。特别是对唐、五代、北宋前期温州区域文化研究，对永嘉学派与当代温州经济文化发展关系研究几近空白。

第二，对永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派的整体把握以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的横向比较研究仍嫌不足。研究焦点往往集中在陈傅良、叶适身上，薛季宣连文集都没有出版。至于叶适以后的永嘉学派门人，更是少有问津。多年来，只有周梦江的《叶适与永嘉学派》一书考证了叶适的门人与师友，十分难得；研究永嘉学派的现有的论著集中在思想层面的比较多，笔者认为，应该把学派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比较各学派运作的机制，如将学派的形成、结构、代际嬗递的模式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好。

第三，永嘉学派在历史上活动时间并不长，几乎是先于朱学、陆学衰落，至于永嘉学派如此短命以及衰落的原因，长期以来归咎于朱学的独尊，这恐怕未脱皮相之见。关于叶适以后的永嘉学派衰落，晚清有志于重振永嘉之学的孙希旦说：

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睿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淮、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火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

嘉先生之风微矣!^⑦

也就是说，在朱学被官方定为正统之前，朱子学派就已经有意识地向永嘉学派的根据地温州传播，经历过两代理学人士的细致耕耘，才完成了对温州的改造。这一过程本身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第四，没有从社会大文化角度，如城市化、文化、教育、社会观念、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角度进行总体把握，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永嘉学派，与当时温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与南宋温州士大夫官僚集团有着直接关系。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除了日本学者冈元司的《南宋温州士大夫的关系》（《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2000年版）有所涉及外，就余者寥寥了，这与史料自身的丰富性是很不相称的。

另外，总体上而言，研究永嘉学派的方法、视角过于传统而有陈旧之嫌。

永嘉学派是一个有思想来源与社会背景的学术思想群体，它一方面体现了唐宋以来特别是宋代温州的社会与文化，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为温州的文化注入了精神特质。如能运用较为新颖独特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审视、研究，则永嘉之学为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等方面当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课题就是在上述学者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运用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发现，永嘉学派首先是一个士大夫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又是从数以万计南宋温州士子中脱颖而出的。因此，研究永嘉学派，必须将永嘉学派的形成和崛起，放在整个温州地区的文化地位的变迁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即在唐

以来，特别是南、北宋之交，温州地区从默默无闻的东南海隅之地一跃而成为在整个南宋文化版图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显赫地位的变迁过程加以考察。

那么，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呢？笔者分析，这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程学的传入；第二，太学、科场制度的变迁；第三，北宋灭亡和宋室的南渡。这三个因素互相影响，并且非常幸运地同时出现在南北宋之交的温州（请注意绝大多数南宋区域拥有第一、二两个条件，但缺乏因素三）。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宋代思想史：那是一个诸家并起的时代，各个学派的争夺焦点实际上都是文化资本，而获取这种文化资本就必须依赖特定知识的制度化过程，没有制度化的知识希望——准确地说是找不到可以制度化的场域的知识——就不可能获得文化资本。特定的惯习——阅读习惯、治学方向、哲学观点、师门人际关系——使士子拥有了某种类型的知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通过特定场域将其转换为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又可以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主要是官职）进行交换，从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某种优势地位。这其中把惯习转换为文化资本的关键场域就是“科场”。永嘉学派的崛起，完全具备了上述特征。南北宋之际，程学的传入使温州士子拥有了文化资本，这一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交换的结果是绍兴年间出现了第一代温州籍官僚，他们保护、帮助了新一代温州士大夫——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展学术活动，永嘉学派又通过自己独创的“制度新学”、“永嘉文体”提高了整个温州地区的文化地位，并在科场成为一种文化资本，使得温州士子在文化再生产和争夺社会资本的竞争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势，最终使永嘉学派在南宋时代与朱学、陆学“鼎足而三”。

总之，以历史的线索，运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描述永嘉学派—温州士大夫集团—温州应举士子三者之间的互动，从而诠释三者互动中隐藏着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换，正是本课题所要尝试的全新理论角度。

有鉴于此，本课题的研究在时间范围上跨越较大，上至唐宋，下至当代，主要内容分以下八个方面展开：

1. 唐五代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温州社会文化状况。包括唐代中后期、五代吴越国时期温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考察。
2. 北宋时期温州社会文化状况。主要研究“庆历新政”肇始的太学法革新和温州士子的游学活动、宋神宗朝元丰九先生的出现和影响、程学在北宋末期温州的传承。
3. 以与秦桧的关系为线索，研究高宗朝程学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状况和科举制度变迁给温州士子带来的机会情况。
4. 以程学温州一脉的终结者、永嘉学派的奠基人薛季宣为中心，阐述程学传入温州后产生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换，研究文化资本如何继续转化为社会资本、程学文化资本的顶峰与结束、新文化资本的完成和永嘉学派“制度新学”的开始。
5. 以薛季宣公认的门人、永嘉学派另一代表人物陈傅良为中心研究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关系。包括陈傅良与南宋科举的关系，朱、陈庙议之争，以“道”“法”辨析为焦点的永嘉学与朱子学的根本分歧等内容。
6. 以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为中心，考察永嘉学派从全盛走向衰亡及其与社会、文化资本转化的关系；研究衰落时期——南宋后期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在科举经术上的角力。
7. 以孙氏父子、兄弟与东瓯三先生为中心，研究永嘉学派的传承关系及其在近代的命运，进而思考儒学的存续规律和现代

化境遇问题。

8. 结合当代温州区域经济的崛起与温州模式的产生情况，探讨温州传统文化特别是永嘉学派思想的现实意义，以期为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注 释

- ① 如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28 《戴先生墓志铭》；虞集：《道园学古录》卷 34 《送李敬心之永嘉学官序》，四部备要本。
- ② 黄震：《黄氏日抄·读叶水心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 宋恕：《书陈蟄庐〈治平通议〉》，载《宋恕集》，页 238，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 ④ 孙诒让：《答温处道宗湘文》，《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孙诒让遗文辑存》，页 84。
- ⑤ 孙诒让：《艮斋〈浪语集〉后叙》，《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孙诒让遗文辑存》，页 335。
- ⑥ 朱维铮：《章太炎与王阳明》，《求索真文明》，页 32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⑦ 陈玉森：《陈亮、叶适学派性研究》，载《论中国哲学史》（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⑧ 周梦江：《叶适哲学思想述评》，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1990 年第 9 期。
- ⑨ 衷尔鉅：《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浙江学刊》1991 年第 1 期。
- ⑩ 潘富恩、刘华：《论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复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 ⑪ 包遵信：《叶适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3 期。
- ⑫ 何俊：《南宋浙东事功学与儒家的传统》，载《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页 385，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⑬ 杨太辛：《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求精神》，《浙江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 期。
- ⑭ 陈国灿：《论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思想》，《安徽史学》1998 年第 3 期。
- ⑮ 徐洪兴：《从训诂之学到义理之学——理学发生史一个侧面的考察》，见原道网站 <http://www.yuandao.org>。
- ⑯ 商聚德：《传统义利观要义及其改造与转换》，《中国哲学史》1999 年第 4 期。